

《大东亚的沉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东亚的沉没》

13位ISBN编号：9787101060676

10位ISBN编号：7101060676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澳]雪儿简思

页数：23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大东亚的沉没》

内容概要

这是甲午战争的历史切片解剖报告，这是引发大东亚格局、秩序巨变的的中日英“三国演义”。高升号事件，一座国际军事史、政治史、司法史的里程碑，一个至今广为传诵的经典案例。作者广泛搜集了三国官方文件，首次全景扫描了导致大东亚“沉没”的高升号事件：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突袭并击沉中国租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船上千名清军及外籍船员罹难，引爆甲午战争。

大清王朝且怒且喜，希望联合英国对抗日本；日本政府大惊失色，担心军方盲动搅乱战略全局；大英帝国群情汹汹，远东舰队要求对日报复……

大清出色而无力的弱国外交，日本阴险狡诈的危机公关，英国在利益与争议之间的艰难抉择。而以高升号事件为开端的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对外战争。日本在军事和国际政治上的完胜，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中国逐渐被边缘化，英、日结成同盟，东方的中心从北京转移至东京……国际军事史学界普遍认为，高升号事件及其结局，成为推动日本军事冒险的原始雪球。

《大东亚的沉没》

作者简介

雪儿简思(Shel Jeanns)，本名陈春，澳大利亚华人。“非职业”历史学者、战争文物收藏家。历史研究侧重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文物收藏主题遍及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以及辛亥革命。

《大东亚的沉没》

书籍目录

序幕第一章 风起朝鲜第二章 不宣而战第三章 击沉商船第四章 怒海求生第五章 悲喜交集第六章 胆大妄为第七章 联合调查第八章 英伦愤怒第九章 激烈争论第十章 风向转变第十一章 被迫认赔第十二章 国弱理曲第十三章 大东亚的沉没后记附录1：高升号事件及相关背景日历附录2：高升号事件人物、名称表附件3：参考书目

《大东亚的沉没》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风起朝鲜 朝鲜内乱，中日出兵。日本蓄谋已久，步步紧逼；中国和战犹疑，处处被动。在日本优势兵力下，清廷终于决定增兵备战，遂雇佣英国商船运送援军，赶赴朝鲜…… 1

几近十年，中日两国在朝鲜相安无事，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直至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东学党号称“替天行道”，以“东学”对抗“西学”，主张“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1894年2月15日，民众不堪苛政，在全璋准统领下于全罗道古阜郡举事。日本认为此是恢复其在朝鲜势力的良机，日本玄洋社遂组织“天佑侠团”，对东学党煽惑接济。到5月底，东学党即控制了朝鲜南部全罗、忠清、庆尚三道，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此时，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为中国在朝鲜最高代表。正值血气方刚的壮年，又是上国钦使，俨然朝鲜太上皇，自然力助朝鲜“平叛”。5月份，袁世凯曾动用出使的中国军舰协助朝鲜官军调动。朝鲜政府内部就是否要向中国乞兵，发生激烈争论。除了亲华与否的政治较量外，分歧更在于对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的担心：按照这项条约，若中国出兵朝鲜，必须通知日本，中朝两国不少官员都担心日本借机出兵。对《中日天津条约》，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一书中，痛惜这是李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的恶果，“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后此两国各执一理，纠葛不清，酿成大衅……”

《大东亚的沉没》

编辑推荐

这是甲午战争的历史切片解剖报告，这是引发大东亚格局、秩序巨变的的中日英“三国演义”。高升号事件，一座国际军事史、政治史、司法史的里程碑，一个至今广为传诵的经典案例。作者广泛搜集了三国官方文件，首次全景扫描了导致大东亚“沉没”的高升号事件。

《大东亚的沉没》

精彩短评

《大东亚的沉没》

精彩书评

章节试读

1、《大东亚的沉没》的笔记-第202页

1907年，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各国迫切希望补充和发展海战和陆战法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会议对1899年的三项公约和一项宣言（即海牙第一公约）进行了修订，并新订了十项公约，总计十三项公约和一项宣言。英国根据“国际法研究院”在根特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提出制定《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并获大会通过，成为海牙第三公约。

针对日本在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中偷袭旅顺港俄国舰队钻国际法空子的行为，《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宣战制度，规定不宣而战是非法的。该公约明确提出，禁止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开始敌对行为，同时，战争状态必须“毫不延迟地通知各中立国”。

而“国际法研究院”提出的另一条原则，即宣战与首次战争行动之间应有合理的间隔期，没有在公约中体现。这最终还是给“有心人”留下了可利用的破绽。此后二战中的所谓闪电战及偷袭珍珠港，在攻击飞机到达前才递交宣战书等，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2、《大东亚的沉没》的笔记-第198页

在西方列强看来，如果要在远东寻找伙伴，中日两国候选者中，充满朝气、步步紧随英国的日本，更适合扮演代理人的角色。中国不仅老迈，而且本身的大国地位很容易对其他列强形成威胁，从而破坏均势甚至提早引爆远东的战争，这是列强、尤其是英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的幅员、地缘和人口等所造就的先天的“大国（未必强国）”地位，注定在当时微妙的国际政治平衡中，难以与任何国家真正结盟，而只能依赖自卫、自保、自强。西方列强所需要的东亚盟友，必须是能够撬动远东的支点，显然，庞大的中国并不适合作为支点，而更适合作为目标和靶子，不仅难以维持周边的可以作为战略缓冲的属国，更难以与列强建立互惠的同盟关系，这可能是从高升号事件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的宿命。

高升号事件，可以看做是英国远东外交的彩排，该事件过程中英国所表现出来的游移乃至内部分歧，都是这个战略形成中的“试错”和调整过程。

高升号事件，令中国朝野弥漫了几十年的对英国的亲善气氛急速消退，李鸿章甚至迅速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前门拒狼，后门放虎，希图依靠俄国来对抗得到英国支持的咄咄逼人的日本。从此，中国外交基本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地步，连此前偶尔还能奏效的“以夷制夷”也不再灵验。英国史学家菲利普·约瑟夫尖锐的指出，中国得以保持领土完整，并非自身外交努力的结果，而是列强们的内讧。他认为，只有日本人最透彻的理解到中国民众缺乏国家概念，其忠诚多是针对乡里宗社的，而“如果中国能真正动员起国民的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则在对抗列强和日本的入侵时，效果一定会好许多。”

甲午战争后，中国虽然依然是远东大国，但国际关系的远东主轴却已经不在北京，而转移到了东京，中国被进一步边缘化，甚至西方各国纷纷将“中国通”使节，调换成清一色的原先供职于非洲的外交官们。这些习惯在地图上用直线划分势力范围的新使节们，毫不理解也不屑于理解中国国情，最后导致使节们与本国政府、中国政府三方面的信息脱节，误解日深。海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表明，这种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义和团——八国联军战争的重要因素。

3、《大东亚的沉没》的笔记-第122页

对于英国来说，对付一个尚未摆脱半殖民地风险的日本（当时列强在日本国内还享有很多不平等

《大东亚的沉没》

特权) 和一个不断衰落的中国, 并在两者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这是对抗俄国南下、维持英国在远东既得利益的最好办法。因此, 英国既要扶持日本崛起, 又要控制这种崛起不至于过度削弱中国。日本外交文件很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对于垂涎满洲和印度的俄国, 中国的利害关系正好同英国是一致的, 而且, 为了不使法国向印度支那扩张其版图, 中国所关注的问题亦同英国相同。”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认为: “这些(英国的) 利益要求中国决不能为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所削弱, 她应当在东方继续占有支配地位。”

正是因为对于英国的态度吃不准, 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前相当犹疑。但在联合俄国进行调停失败后, 英国政府选择了放任日本。1894年7月16日, 英国出乎意料地在新的《英日通商航海条约》上签字, 条约规定完全废除治外法权, 成为日本同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条约签订后, 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向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祝贺说: “这条约的性质, 对日本来说, 比打败清国大军还远为有利。”

英日修约在客观上加快了日本“征韩”的步伐。在修约的第二天, 7月17日, 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 决定开战, 并制定了作战计划。正如日本史学家远山茂树指出: “使日本有从事战争的可能的第一个条件是她得到了英国的同意。”青木周藏随即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 急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开战愿望: “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等待斗大的鱼一网打尽, 而枪声尚未发, 深为叹息! 深为叹息!”

7月23日, 英国照会日本: “今后中日两国若发生战争, 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中心, 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及其附近作战的保证。”日本外务次官林董承认, 在开战前因担心英清之间存在相互援助的密约而犹豫, 但英国发出照会要求上海中立后, 日本“证实了英清之间没有任何盟约”, “朝鲜事件的发展终于到了除开战外别无他途的程度, 于是宣战”。

4、《大东亚的沉没》的笔记-第168页

高升号事件及随后的重庆号事件、巴山号事件, 给大清帝国笃信国际秩序与正义的“宋襄公”们, 上了一堂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践课。美国历史学家赫兰德尖锐指出: “高升号事件证明, 所谓的国际法, 就是强权的工具而已。”

国际法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 中国的外交理念逐渐步入近代化。“大沽口船舶事件”、“马嘉理事件”中都曾经按照国际法“依法办事”并有所收获。此后中国官方、尤其是洋务和外交部门, 官员们多对国际法比较熟谙乃至迷信, 以为“各国互峙争雄, 而公法行乎其间”。中国最早的外交家郭嵩焘认为: “夫能以诚信待人, 人亦必以诚信应之”。王韬主张处今日之世, “惟有开诚布公, 讲信修睦”。甲午战争前的交涉中, 李鸿章还一直认为“两国交涉, 全论理之曲直, 非恃强所能了事”, “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 我不先与开仗, 彼谅不动手, 此万国公例, 谁先开战即谁理诘”。

而日本人也差不多同时期接受了国际法, 但却比中国人更清醒的看到了国际法在国际角逐中的局限性, 从而娴熟地将其作为包装手段加以运用。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的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深刻的指出: “今日乃豺狼世界, 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 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 谋求国运昌隆。”“兵力不整时, 万国公法亦绝不可恃……亦不足恃, 亦不足守”, 可谓一语中的。

两国的认识差距, 在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的谈话中充分表现出来。李说: “两国和好, 全凭条约”, “恃强违约, 万国公法所不许”; 而森有礼却称“和约没甚用处”, “国家举事, 只看谁强, 不必尽依着条约”, “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鸿章直到最后才认识到: “国际上没有外交, 全在自己立地, 譬如交友, 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 我要联络他, 他也要联络我, 然后够得上交字, 若自己一无地位, 专欲仰仗他人帮忙, 即有七口八舌, 亦复无济于事。”可惜为时已晚。

5、《大东亚的沉没》的笔记-第120页

日本外交, 被西方史学界称为“霞关外交”。霞关是日本政府所在地, “霞关外交”最大特点就是日本将外交置于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 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明治时期日本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

《大东亚的沉没》

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务省被作为六部之首，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笈英伦，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到19世纪90年代，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大量毕业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还应井上馨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因此，日本外交十分注重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并在国际法领域与英国的专家密切合作。在以“法”（国际法）办外交的思路下，日本在高升号事件的调查和处理中，反应快速，措施得当，充分抓住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

“霞关外交”的特点，除了重视国际法之外，还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惯用模糊词语，如果不能蒙混过关，则将责任推给中下层的执行者，高层故作无辜，以此赢得回旋余地；日本外交也十分注重在强者面前的低姿态，一旦军方行动引起强者不满，会毫不吝啬向强者道歉，以避免强者盛怒的锋芒，这一特点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强大的宣传机构，聘用大量外国顾问，保持与西方舆论界的密切联系。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外交机构竭力鼓吹其出师朝鲜的正义、日军的神勇和“文明”，及其在朝鲜的改革符合西方的利益，这与中国不向西方提供任何信息的封闭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大东亚的沉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